

从晚期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 ——哈贝马斯危机分析模式的当代价值

蒋天婵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摘 要: 哈贝马斯的危机分析模式对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有重要价值。他指出国家在晚期资本主义对经济的介入并不能根除经济危机, 而是使得经济危机向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转移, 产生了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这一模式后经弗雷泽改造被用于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弗雷泽认为, 金融资本主义时期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尽管促进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 但也损害了资本长期积累所依赖的公共权力, 从而导致了合理性危机。然而, 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常识的过滤下, 合理性危机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并没有围绕分配模式的改革, 而是集中于社会认同理念之争。尽管哈贝马斯和弗雷泽的理论丰富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但是他们弱化了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 从而偏离了将经济判定为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由此, 如果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该模式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则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政治和文化理论。

关键词: 晚期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合法化危机

中图分类号: F038; F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20)06-0022-07

2016年, 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成为美国总统。他的获胜使得“危机”这一议题成为左派学者关注的焦点。和这一议题相伴随的是学者们对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全球化是否完结, 新自由主义是否告终, 金融资本主义是否迎来了转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改造了哈贝马斯的危机分析模式, 将其转化为把握金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综观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哈贝马斯通过对晚期

资本主义的分析, 描绘了危机在社会各个领域蔓延的景象。然而, 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衰弱、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 哈贝马斯所提炼的导致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等的社会条件不再成立。由此, 如果要将他的危机理论用于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就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弗雷泽通过吸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重新定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改造了哈贝马斯的危机分析模式, 为了解当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而在论述她的观点之前, 首先需

收稿日期: 2020-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CZX006)

作者简介: 蒋天婵(1985—), 女, 江苏靖江人, 讲师, 博士, 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要了解她改造的对象,也即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

一、晚期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哈贝马斯的危机分析模式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所针对的是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西方社会形态,他将这种社会形态归属为晚期资本主义。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概念的接纳表明,哈贝马斯认为尽管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本质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1]。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用“晚期”突出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晚期资本主义”是对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容。在这一时期,国家不再放任自由市场,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了经济。

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时,哈贝马斯首先引入危机作为研究对象,他指出危机分析不仅涉及社会结构的经验性变化,而且涉及主体的认同。其次,哈贝马斯构建了“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的分析框架。他把社会划分为文化、政治、经济三大亚系统。每个亚系统都可以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两个方面考察。再次,通过追问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关系,哈贝马斯对组织原则进行了论述。他根据组织原则划分了社会的不同形态,并由此判定了某一社会形态的可变范围。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2]6}。它主要涉及生活世界中个人的社会化、人的交往、人对于规范结构的认同。借由“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指出制度规范、价值体系通过对人的整合而维持自身。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2]6-7}。由此,系统整合关系到的是某一特定系统为了维系自身、解决系统问题而采取的手段。最后,哈贝马斯阐述了“组织原则”。组织原则包含生产力机制和解释系统^{[2]21}。一方面,生产力机制、解释系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途径和解释内容的可更新的范围。另一方面,它们的发展也使得冲破当下的形式有了可能。学者可以通过分析特定阶段的生产力机制和解释系统来判定某种规范结构的可变

范围。

哈贝马斯根据组织原则区分了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又被分为两个阶段: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其特征在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干预不但没有根除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危机,而且促生了其他系统的危机。参考他对社会系统和系统整合的论述,以及对经济、政治、文化系统的区分,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类危机可用表1表示。

表1 晚期资本主义危机

危机类别	经济系统	政治系统	社会文化系统
系统危机(系统整合)	经济危机	合理性危机	
认同危机(社会整合)		合法化危机	动机危机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一方面通过取代市场行为从而为缺乏内动力的积累续命,另一方面通过补偿积累过程带来的消极后果从而避免政治反应。国家干预经济运作的举措造成了一系列后果。例如,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剩余价值的产生源自对工人的直接剥削。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而降低生产成本,赚取利润。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教育、管理被纳入生产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间接来源。其次,在垄断部门中,劳动力的价值由工会与企业协商达成,从而成为“政治性的”,这造成了局部的阶级妥协。但是,哈贝马斯指出国家的干预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行政手段不能改变市场的价值规律,而只能推迟市场自发运作必然产生的结果的出现。因此,它虽然压抑了周期性危机的急性发作,却也将其转化为慢性疾病,导致经济危机有了新的形式。首先,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内生的停滞(萧条)倾向”“经常性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2]71}。此外,经济领域自发危机被压抑的代价是政府自身压力的增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不景气最终导致的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经济危机由此向政治领域转移,触发政治危机。

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包括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合理性危机是指“行为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2]65}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介入自由市场,以集体意志的面貌出现。然而,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与个体资本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会牺牲后者的直接利益来维持整体的稳定。此外,个体资本之间存在竞争和利益冲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个体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会转移到行政部门,从而表现为行政决策过程中的矛盾。“合法化危机”是指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2]65}首先,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价值规范崩溃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建立在公平交换原则上的市场制度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然性和自发性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性自然法以及价值提供了合法化依据。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经济的介入改变了市场自发运作的模式,使得依赖于该模式的价值体系受到挑战。其次,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经济危机向政治系统转移。一旦国家对危机的控制失败了,那么它的各种举措的合法化就会被撤销。换言之,合理性危机会导致合法化危机,行政手段的失败会导致对其合法性的质疑。

合法化危机的解决需要文化系统为新的合法性论证输出原料,从而促使公民就合法性问题达成新的认同。如果文化系统的输出无法满足这个需要,那么动机危机就会出现^{[2]99}。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系统提供的动机是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前者有赖于前资产阶级的国家伦理和家庭取向,后者由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成就意识导出。但是,晚期资本主义不仅破坏这两个动机,而且没有产出替代物^[3]。由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系统无法为合法化的重新达成提供养料,从而导致动机危机。

综合上述的论证,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尽管仍然将经济领域的危机视作其他危机的根源,但也综合了对社会系统、社会认同和解释系统的探讨。首先,在历史性的维度上,他的“组织原则”概念是对生产力机制和解释系统的统称。这二者共同定位了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的特征和变化范围。其次,在对既定社会的危机分析中,哈贝马斯指出对任何亚系统危机的分析都可以从认同的角度切入,并由此引入了构成其危机理论重要部分

的对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论述。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危机分析模式的改造

哈贝马斯所针对的晚期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走向了衰弱。其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金融资本主义。从这个时候开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自由贸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主题。资本主义的变化促使一些学者对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和改造。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左派学者南希·弗雷泽。通过整合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重新定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弗雷泽将哈贝马斯的危机分析模式改造成了把握金融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并以此对当下美国的社会局势进行了研判。

弗雷泽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改造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她弱化了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哈贝马斯将社会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亚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中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矛盾所引发的链式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仍然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将经济领域看作基础性的: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政府介入自由市场,从而引发了合理性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了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与哈贝马斯相比,弗雷泽将政治抬高到了与经济并驾齐驱的地位。她认为资本主义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包含了“经济与行政的区分,私人权力和公共权力的区分,以及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的分离”^[4]。这种区分表明政治和经济自资本主义诞生起就是两个并存的领域。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产生的结果,政治有其独立的职责和范围。另一方面,政治外在于经济。弗雷泽由此将讨论引向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弗雷泽认为,首先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依赖于政治条件:“如果缺少了支持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换的法律框架,那么资本主义是不能想象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叙事就在于公共权力对财产权的保证,对契约的执行,对争执的裁定,对反资本主义的镇压,以及维系……货币供给的‘充分信任与尊重’”^[5]。不仅在国家内部如此,在地缘政治的层面,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需要

跨越国家的边界。这种积累的实有赖于国际政治条件,如国际法、各国势力在全球的分布等^[4]。其次,弗雷泽强调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边界之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像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经济对政治施加影响,政治做出反应,而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弗雷泽认为政治和经济有各自的动力,“经济的动力在于无穷的积累和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政治的目标在于提升公共行为的能力以及公众对其合法化的支持”^[4]。由此,政治和经济之所以存在边界之争是因为二者涉及不同的权力:政治是公共权力的应用,服务于公众;经济是私人权力的应用,追求私人利益的实现。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作用是两种权力之争:一方的推进引起另一方的退守。由此,资本主义内部的根本矛盾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矛盾。毋宁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蕴含了一种张力: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政治公权力为其背书;另一方面,资本的扩张又带来私人权力的扩张,会侵蚀公权力的范围。由此,整个资本主义的演变可以按照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各自的范围,以及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来划分。

弗雷泽因此重新定位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关系。政治领域的危机和矛盾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经济领域矛盾的表现,或者仅仅是经济危机的延伸。由弗雷泽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论述可以推出政治的危机和矛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政治在与经济的边界之争中出现了功能失调,它无法很好地应用公共权力处理公共问题,由此无法履行职责。在弗雷泽看来,政治矛盾可以导致两种政治危机。其一,它可以导致合理性危机,也即“公共权力缺少有效管制的必要能力”^[4]。例如,政府机构被私人或者团体裹挟,无法出台相关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其二,政治矛盾可以导致合法化危机,也即“公众力量反对对公共权力的攫取和掏空,他们剥夺了既定安排的合法化。行动主体试图重构政治机制,使其服务于公共利益”^[4]。尽管弗雷泽仍然采取了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的表述,但是她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不同于哈贝马斯。首先,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合理性危机”被定义为政治亚系统系统整合的失败,也就是政治亚系统功能的失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对政治的具体功能以及危机的具体内容的阐述是基于历史的视角。例

如,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同,晚期资本主义的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干预,而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想解决经济危机。由此,当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政治系统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从而赋予合理性危机以及合法化危机新的内容。反观弗雷泽,她对合理性和合法化危机的定义不是历史性的。她的理论预设了政治的一种本质工作:解决公共事务。如果公共事务或者公共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政治领域就会面临合理性甚至合法化问题。由此,可以推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包括晚期资本主义,政治都需要解决公共问题,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由此,弗雷泽没有参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前一个阶段的具体特征来看待下一个阶段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危机。她对政治系统危机内容的规定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各个时期。其次,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系统出现的危机根源仍在于经济系统。但是,在弗雷泽的理论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因果锁链被打破了。她将公共权力是否有效的应对公共问题设为合理性危机存在的前提,将公共权力是否得到认同作为合法化危机的关键。以此为前提,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的定义与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危机没有必然关联。换言之,弗雷泽在逻辑上没有排除两种可能:在经济运作良好的情况下,社会仍然出现政治危机;或者尽管出现经济危机,但是社会政治层面保持了稳定。

第二,弗雷泽引入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改造了哈贝马斯的危机观。哈贝马斯认为在动机危机的中介下,合理性危机转变为合法化危机。具体而言,当政治系统无法解决经济危机时,公众对整体的合法化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当文化系统无法为政治的合法化提供论证资源时,合法化危机就会出现。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动机危机为什么出现?哈贝马斯认为动机危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批判精神的大众坚定地要求统治被正当化或者被废除”^[4]。弗雷泽认为哈贝马斯的论述将动机危机归结为人的抽象特征,从而低估了合理性危机转变为合法化危机的复杂性。基于这一判断,她引入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代替哈贝马斯对动机危机的论述。所谓的霸权是指“统治阶级通过将自身世界观的假定设立为社会整体的常识,从而确立自身的权威并使其统治自然化”的过程^[4]。这一过程在组织层面依赖的是“统治阶级召集的不同社会力量的联盟”^[6],也即霸权

集团。具体到被常识化的假定,弗雷泽认为这些假定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分配的理念,其二是关于认同的看法^[6]。前者涉及收入的分配,主要和社会的经济结构及阶级分布有关;后者关系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归属,它涉及社会价值理念的建设^[6]。在弗雷泽看来,被常识化的假定,即政治常识在合理性危机向合法化危机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规定了社会主体理解并体验合理性危机的方式,从而影响了给他们对合理性危机的认知,以及面对合理性危机时采取的行动^[4]。因此,合理性危机能否转变为合法化危机并导致社会变革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某一阶段发展的政治常识。我们可以由此推出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合法化危机,那么就存在某个阶级通过构建霸权集团,从而将本阶级的世界观常识化并冲击了之前的霸权。由此,合法化危机预设了霸权危机。

通过对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改造,弗雷泽确立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模式,并将其用于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和当下的资本主义局面。一方面,根据经济和政治、私人权力和公共权力的所辖范围,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弗雷泽描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分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根源。另一方面,她详细阐述了金融资本主义下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和政治常识。最后,根据对合理性危机的论述和对政治常识的把握,弗雷泽对当下的美国政治现状进行了判断。她认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溃败,而只是标志了进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金融资本主义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形态。按照弗雷泽的看法,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为资本自由流动拆除藩篱……为银行松绑,扩大掠夺性债务,去工业化,削弱工会,推进不稳定低收入工作”等^[6]。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私人权利对公共权力的侵蚀,使得各国政府缺少处理公共问题的能力。首先,在国际层面,一方面,资本的跨境流动要求征服各国的领土,摆脱各国政府的管控。1976年,“牙买加协议”签订,协议不仅巩固了美元本位制而且要求推进浮动汇率制。由此,除美国之外的协议参与国放弃了对本国汇率的控制,从而丧失了应对危机的关键工具^[4]。另一方面,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这些组织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动经

济自由化。其次,对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国家不但成为全球化生产的低端环节,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廉价劳动力,而且开放了本国市场,实行了资产私有化。再次,对处于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而言,其本国的公共权力也遭到了削弱。第一,金融资本规训了国家和公众,使其服务于私人投资者的直接利益^[4]。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本国产业出现了两级化。以美国为例,一边是阳光地带的高科技公司、产业化大学以及风险资本的欣欣向荣;另一边是大量的劳动力流入服务行业,形成低收入群体^[4]。在弗雷泽看来,公共权力的衰弱并不利于资本主义的长期积累^[4]。资本主义长期积累需要公共权力为其解决社会问题。然而,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化进程削弱了公共权力,使其无法应对社会问题。因此,金融资本主义时期急剧扩张的经济自由化并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相反,公共权力的失调孕育了合理性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效应都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公共权力衰弱的问题。

在论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根源之后,弗雷泽探讨了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霸权或者政治常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展开,新自由主义逐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确立了霸权地位。弗雷泽认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政治常识包含了几个方面。第一,主体被按照企业主义模式塑造^[4]。个人以经济主义的视角审视自身,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企业主,处在和他人的竞争之中,他们不仅以商品的标准评价自身,而且追逐这种商品的利润最大化。由此,尽管金融资本主义强调个体的自主性,个体的责任和选择,但是自主是以自身利益为中心,责任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是要求评估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由此,金融资本主义对个人的强调等同于对私人性的强调,自由被“消解了公共政治的意义”,仅仅和私人利益相关^[4]。与对个体私人性强调相一致的是对公共权力的冷漠和敌视。公共权力被放在了个人的对立面,被形容为压抑的、效率低下的。其负面性的体现就是个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丧失了自主性,成为消极的等待救助的对象。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问题都被归结为公共权力的扩张。最后,金融资本主义塑造了以市场为核心的分配正义理念^[4]。这种观点认为,

分配应该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和集体不应该介入分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正义和公平的诉求排除了分配模式的改革和社会公共领域的改革,取而代之的是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理念。

以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常识的描述为前提,弗雷泽对当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局势进行了评价。她的理论回答了一个问题:2016 年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获胜是否标志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危机和合法化危机?对于这个问题,弗雷泽认为美国确实已经发生了政治危机,但是该危机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崩溃,而是标志着进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参照对分配和认同的区分,弗雷泽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进步新自由主义,二是反动新自由主义。进步新自由主义综合了进步的认同理念和落后的分配理念。在分配问题上,进步新自由主义支持市场化原则,认为公共权力不应该干预市场;然而,它却招安了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运动的支持者,从而构建了霸权集团^[6]。进步新自由主义所赞同的社会运动将社会解放的希望寄托于身份认同,它并不反对市场化,甚至与后者的支持者一起攻击社会保障理念。进步新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自身的霸权,它在今天表现为以“政治正确”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景观。希拉里被弗雷泽认为是进步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 2016 年总统选举中的落败被看作是进步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然而,弗雷泽指出击败希拉里的特朗普并没有站在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他只是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版本:反动新自由主义。反动新自由主义与进步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二者在认同问题上的对立。它“尽管宣称会促进中小商业和制造业,但其真正的经济计划是巩固金融业,支持军火生产和能源行业”^[6]。由此,在分配问题上,在对待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态度上,反动新自由主义和进步新自由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它的系列的举措仍然是服务于少数富人,而不是惠及公众。反动新自由主义用来迎合底层群众的不是他的经济计划,而是它对“政治正确”认同观的反对。特朗普以“民族国家主义、反移民、亲基督徒……”形象获得了“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南方白人、美国偏远小镇居民、心怀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支持^[6]。这些人曾经在“政治正确”的潮流中被蔑视,被边缘化,而今他们在特朗普的竞选理念中获得

了肯定和认同。

三、哈贝马斯危机分析模式之价值的当代拓展

尽管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哈贝马斯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模式却未因此过时。正如弗雷泽指出的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即便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设法避过了经济危机的内在趋势,但它却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矛盾。它所做的是用一种危机代替另一种危机,把危机中心从经济转移到政治”^[4]。基于这一论断,弗雷泽对哈贝马斯的危机模式进行了改造,将其应用于考查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形成的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助推下的金融资本尽管摆脱了行政干预、急速扩张,却也损害了其稳定积累所需要的公共权力^[4]。它导致政府无力处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引发了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弗雷泽的深刻之处在于她把握了当前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运动的特征:重视身份认同,无视分配公正。不管是女权运动,还是黑人运动,与身份政治纠结在一起的呼吁平等解放的社会运动大多聚焦于确立新的社会认同理念,从而获得平等对待。但是,弗雷泽表明这种社会运动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并没有触及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关键:市场化的分配模式,对公共权力介入再分配的排斥。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其当下的社会局面是表现为具有不同身份,秉持不同认同理念的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仍然服务于少数富人。

但是,分配模式的改变可以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吗?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分配的变化不能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即对经济基础性地位的否定。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尽管关照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的重视,但是,他对“组织原则”的论述已经将解释系统视为历史变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使之获得了与生产力一样的地位。随着哈贝马斯逐步构建交往行动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对生产力的论述、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普适的对语言行动有效性的分析;马克思对推翻资本主义的号召被对交往理性的呼吁代替。相似

的,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危机分析模式的改造也压制了经济在理论中的地位,用政治与经济的边界之争代替了经济领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弗雷泽要求改变资本主义当下的分配模式,但没有要求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马克思的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雇佣劳动成就了资本家对工人所产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也导致工人在资本主义中的弱势地位。由此,如果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依靠分配领域的改革或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促进是无法根除社会不公的。由此,哈贝马斯和弗雷泽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充分的。

从自由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根源。利用马克思主义认知资本主义,一方面,需要丰富其理论,使之在面对资本主义新特征和复杂性时展现强大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则需坚持其理论的核心,包括马克思对经济基础性地位的判断,对劳动价值论的肯定以及对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定位。就这两个方面而言,哈贝马斯危机分析模式的重要性在于它展现了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和政治、文化的复杂性是可以兼容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运作的变化是探索资本主义的起点;经济对政治施加了影响,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应对经济问题的措施会引发特定的合理性和合法化需求;政治层面生发的特定需求的满足有赖于文化领域的输出;对社会认同、生活世界以及霸权的探讨则展现了这些需求满足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凸显了文化和政治运行自身的特征。然而,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后期的理论和弗雷泽对其理论的改造都偏离了这一轨道,他们都压制了经济的地位。由此,如果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哈贝马斯的分析模式为工具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研究,那么就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并以经济论述为起点沟通政治和文化理论。例如,在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时,一方面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促生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大量劳动力或是失业或是流入低收入服务行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经济领域,阶级剥削和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仍然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表现,它并没有脱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过程。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常识的过滤下,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和

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结构性问题被遮蔽了。在政治层面,阶级斗争被身份认同之争取代,变革生产方式的要求被在立法层面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吁取代。政治和文化并不总是经济领域真实状况的反馈,在一些情况下反而会遮蔽基本的经济矛盾。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性并不会削弱经济的基础性地位;相反,它更加凸显出了经济作为深层社会结构是社会根本改革、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张亮. 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晚期资本主义”: 一种历史考察[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4(5): 8-12.
- [2]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刘北城,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 傅永军. 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述评[J]. 哲学研究, 1999(2): 39-45.
- [4] FRASER N. Legitimation crisis? On 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of financialized capitalism [J].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2015(2): 157-189.
- [5] FRASER N. Behind Marx's hidden abode: for an expanded conception of capitalism [J]. New Left Review, 2014(86): 55-72.
- [6] FRASER N. From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to Trump and beyond [J]. American Affairs, 2017(4): 46-64.

(责任编辑:许宇鹏)

